

哪些外国政要书籍

在中国畅销？

胡程远 石磊

5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在他访华前的5月13日，《普京文集（2012—2014）》在北京首发。其实，除了普京的书，许多外国领导人的相关书籍在中国都非常畅销。这些书籍，让中国人民读到了外国元首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搭起了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

民众评价颇高

北京朝阳区一家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介绍，《普京文集（2012—2014）》未正式上架前，已有很多顾客来咨询这本书。

其他关于普京的书籍销售情况一直不错，如《普京传：他为俄罗斯而生》等。“俄罗斯今天良好的发展势头与普京的设计和蓝图密不可分。中国老百姓对此非常感兴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部副主任苏晓晖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中国民众对普京的推崇在“当当网”书评中可见一斑。“他正驾驭着俄罗斯这辆战车在狂奔，值得佩服和感动。”网友“或许累了”评价道。“这可是我的偶像！得好好拜读。”网友“城市里的老蜗牛”毫不掩饰对普京的崇拜之情。

除了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所著的《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也十分畅销。这本书在“当当网”所有传记类书籍销量排行榜中名列第二，在政治人物传记销量名单中排名第一。2014年4月，中央电视台公布了“首届中国好书评选结果”，此书赫然出现在其中，这也是其中唯一一本由外国领导人撰写的书籍。

内容十分丰富

在国内畅销的外国领导人书籍主要分为传记、回忆录、演说和讲话辑录、论文集等几大类。其中，数量最多、传播范围最广的，莫过于领导人退休后出版的回忆录。比如美国前“第一家庭”克林顿夫妇的《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和《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两人在书中记叙白宫8年的生活，向世人展现一个美国家庭的权力故事。

此外还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回忆录《希拉克回忆录：步步为赢（1932—1995）》，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回忆录《我的奋斗历程》，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

《与自己对话》等。除了回忆录，外国的一些高官政要也会对自己的发言进行汇总，出版一些谈话、语录，这其中，尤以欧洲国家的前领导人最具代表性。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离职不久，就在全球范围内举办个人演讲，并将演讲内容集结成书出版。英国另两位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讲集，在书店里也随处可见。

此次出版的《普京文集（2012—2014）》收录了俄总统普京2012至2014年公开发表的竞选纲领、国情咨文、演讲和答记者问等文章40余篇。“该文集是俄罗斯领导人思想、观点、工作思路的宣示，且都是原文辑录。它必然是中国政府各级干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中国公众了解俄罗斯情况、社会环境走向、俄罗斯领袖和人民思维方式和理念的重要参考文献，也会是中国投资者了解俄罗斯和制定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梅新育说。

重要交流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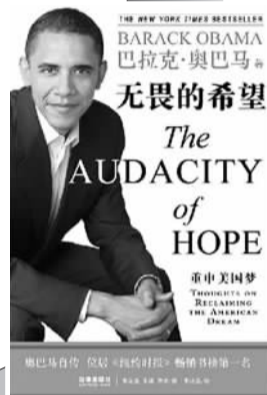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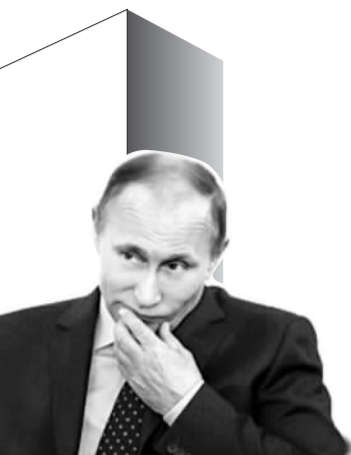
笔者浏览各大图书网站发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著《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著的《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等领导人书籍都一直高居畅销书目榜单。

对此，梅新育表示，“这并非一个新的特征”。他认为这些传记、文集，能帮助读者较快把握住这些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根本上，这与中国老百姓日益开放的思想、对国际政治的浓厚兴趣是分不开的。

此外，梅新育还指出，“由于中国分量日益加重，外国社会日益重视对华公共外交，因此越来越多的外国政治领导人寻求在中国媒体露面、在中国出版书籍，希望借此赢得中国社会的支持、同情，为自己加分。”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柏英告诉笔者，《普京文集（2012—2014）》此次在华发行，于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发，凸显了中俄关系的重要性。

“中俄间接触非常频繁，大国间如此密切的交往在世界上并不多见。在普京访华前夕出版这本文集，也是为了使我们民众去关注俄罗斯这个国家，关注它的领导人。这是我们促进双边交流的方式之一。”苏晓晖说。



我们往往会犯一种错误，就是“当我们手中唯一的工具是锤子时，我们会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是钉子”。可以说，在相当多的商业模式和政府机构中，人们不善于正确使用量化方法，已然产生了量化倒置的后果。

这个时代，可以说，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把握了成功。道格拉斯·W·哈伯德的《数据化决策》，从思维方法的精髓起步，对于界定问题给出清晰分析方法。作者认为，在专业的领域内量化，可避免低效的投资和管理失败案例的发生。凭直觉和经验做出的决定，太过冒险，也不划算。无论是人身的健康，还是生活的幸福度，抑或是投资股市的风险，都可从中找到相对应的灵活有效的量化方法，从而避免弯路和歧路。

一切皆可量化

薛俊美

一个重要的决策，取决于人们对这个事物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如果你知道了任何事物都可以量化这一神奇的事实，你会受益无穷。《数据化决策》阐述如何量化事物并专注于不确定性、风险和信价值；详解如何使用各种方法减少不确定性，包括随机抽样和控制实验；最后以有趣的量化方案和案例，讨论了如何量化诸如偏好、价值、灵活性和产品质量等。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量遍天下没商量。

用定量的眼光看世界，用校准的眼睛观世界，用思辨的眼神观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都得益于此。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说，“要取得知识的进步，没有比模棱两可的话更大的障碍了”，让量化更加直观和可行，就不会被管理者左右和遥控。

需要注意和强调的是，量化的开始阶段最有价值，所以要循序渐进地量化，每做一步都要积累、总结和反馈。要知道，魔鬼就藏在这些密密麻麻琐碎的数据中，而正确的决策毫无疑问——就藏在正确的量化中。

一切皆可量化，不再是传奇和神话。开始吧！

神州

“淘”到另一个自己

章杰

己，霎那间旧爱满怀，那种感觉用手不释卷形容都不够，真是爱到骨子里。我每每读它，总是想，30年后的静宛今在何处，她还在读书么，或者像我这样嗜书如命？可她为何遗弃了这些宝藏，莫非是生活辗转所致？这些已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她一定还能记得这些美好的回忆。

另一次，在扎堆的旧书中，我翻到一本袖珍版的《随园诗话》，随手打开就看到一句话，“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我觉得这话像是说我，说我读书之余营营役役的写字事。辛苦地构思，一次次地修改，常常因为定稿一句话，绞尽脑汁，那些清寂里的暗爽，是局外人难以体会到的快乐。后来每天上班，我都如珍似宝地带着它，在车上、路上，站着、走着，书就捧在眼前，人忽尔被一个刹车跟踉，或一不小心撞上行人和阻物，有人不解，有人窃笑，而我自顾如痴如醉。

后来出差一月，回来时，门前的那个旧书摊不见了。我不知原因，可又想知道原因。那个摊主去了哪里，或发生什么变故？我黯然无欢，茶不思心不宁，失魂落魄地周遭寻找，可再也没有遇见那个旧爱，那种感觉是时刻绕在心头的想念。

网上有“淘宝”一说，淘宝族把这一行为称作“小淘宝”，言下是说，淘的不是珠宝，是一些小欢喜，是相见如故的爱，比如我之于那些书，之于那个旧书摊。我相信它一定还在某个灯火阑珊处。某一天蓦然回首，首，在转角，在一直回旋的心间，我依然会淘到另一个自己……

中国藏学渊源深厚

张三

在我国各种文字的史料中，藏文的数量仅次于汉文。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来源。

早在明成化十二至十四年（1476—1478），藏传佛教噶举派大译师管·宣奴贝（1392—1841）所著《青史》，就对公元978年以后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众多支派的出现、各派的传承及名僧事迹，作了详细记载。该书篇幅宏富、纪年清晰，编写时博采众家史籍，保存了许多原始史料，被后世教法史大量直接采用，系藏族最为重要的历史宗教文化经典之一。《青史》素来深受治藏史与佛教史学者的重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由苏联藏学家罗列赫和根敦培译成英语，上世纪80年代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文版，西藏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郭和卿先生的汉译本，但因时间仓促，颇有错漏。近年，王启龙、还克加以四川民族出版社藏文版为原本，在罗列赫英文、郭和卿汉文两个译本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全部的汉译，并增加了大量的注释，使得本书终于有了汉译全本。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版）（王尧、王启龙、邓小咏著）、《中国藏学史（1950—2005）》（王启龙、阴海燕著）和《青史（足本）》（管·宣奴贝著，王启龙、还克加译）这3部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著述，可谓是我国藏学发展历程的一次系统完整的整理。三足鼎立，凸显出中国藏学的历史渊源和深厚根基，兼具中国藏学的中国性和藏族性两大属性，重申了藏学研究的主体性。中国藏学既是藏学，又是中国边疆学的一部分，这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合二为一的，这也是《中国藏学史》以及《青史（足本）》出版的重大意义所在。

小小铜钱，曾被赋予通胀通缩功能

吴念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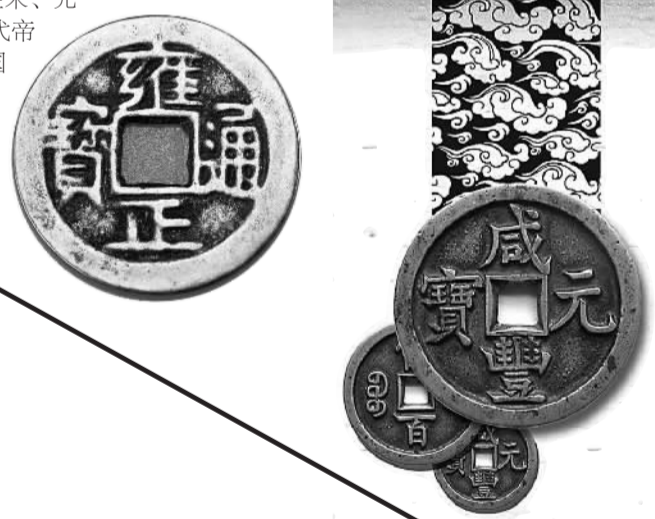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出版的有关中国货币金融史方面的著作，总体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石俊志研究员，用几年时间对中国历代货币演进的历史，做系统、全面的研究，至今已有4部专著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他所著的《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借助货币学、法学和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交叉研究，总结中国古代各王朝采取的货币法规、政策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探索各王朝盛衰兴替的经济原因，视角新颖独特，是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货币法制史学术专著，填补了从法制角度研究中国金融货币发展演进历史的空白。

作者认为，中国货币法制研究的对象是法定货币，主要为法定非称重货币，即铜钱和纸币。官方发行的流通纸币主要集中在宋、元时期，而铜钱的流通则贯穿历代帝皇专制历史的始终。中国古代货币立法，不仅赋予铜钱信用

货币的特性，而且也使铜钱具备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功能。秦统一全国，下令废除各诸侯国的铜钱，统一为秦国的“半两钱”，同时禁止百姓铸造铜钱。秦亡后，汉朝两次开放百姓铸造铜钱。作者鲜明地指出，中国历代王朝扩大铜钱发行，铸造减重铜钱和虚币大钱，借助通货膨胀来收敛掠夺百姓的财富。

作者紧紧围绕历代政治经济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政权的更迭，对从秦汉初期货币立法、货币政策、货币工具到唐代的制度变化和钱荒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对宋代货币政策变化所导致的货币多元化元和元代单一货币制度、明清两朝货币制度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读者能更深入、透彻地了解中国历代货币法制、货币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特别是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要盲信

畅销书排行榜

张立美

畅销书排行榜上只有不到1/3的图书是自然畅销。而读者仍然根据注水的畅销书排行榜选书和买书，无疑会被误导，没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好书，造成了经济损失。换言之，畅销书“买榜”，实质上是扰乱了图书市场的正常秩序，是在欺骗、欺压读者。

出版社和书商热衷畅销书“买榜”，说白了就是另一种打广告形式，拉动创收，而且相比较而言，“买榜”成本低，获利比较高。从畅销书“买榜”模式来看，很少有出版社与电商相互勾结，制造假的畅销书排行榜，而主要是出版社和书商自掏腰包，雇佣水军或者单位职工花钱在短期内回购图书，冲上畅销书排行榜。回购图书的成本一般不过是图书定价的一两折，意味着“买榜”一本书不过一两块钱，这笔成本只需卖出不到1万册图书就能收回，“买榜”成本之低和获得利润之高可想而知。

对于误导读者的畅销书“买榜”行为，监管部门不能任之由之，必须加强监管。除了要求电商部门通过技术手段防止“买榜”之外，关键是对“买榜”的出版社和书商给予惩治，处以高额罚款，提高“买榜”的违规成本。另一方面，广大读者在选书和买书时也不要盲目迷信畅销书排行榜，冷静考虑图书的内容、作者等因素，看看“畅销书”是不是真的是自己需要和喜欢阅读的图书。同时，文化部门必要时可以邀请出版人、专家学者在没有任何商业因素的影响之下，定期制作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好书排行榜，为读者选书、买书提供参考。

很多人买书都会参照电商网站的图书销量排行榜。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员不久前指出，这些榜单有可能失实，是出版机构花钱买来的。而部分出版商也坦承，由于竞争激烈，而读者主要靠排行榜作为买书依据，不“买榜”出版社就没法活。

年产几十万种图书，虽然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好书机会，但在无形之中加大了选择难度。这使得各类畅销书排行榜成为阅读的风向标，一份读者调查表明，对于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图书，仅有12%的读者表示不理睬。

出版社和书商对畅销书“买榜”，导致畅销书排行榜严重注水失真。一位出版社资深编辑曾经说过，一些电商网站上的畅销书排行榜“买榜率”高达70%，意味